

《狂飆年代》三部曲 之二

寒山碧 著

逃亡



东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出版

《狂飆年代》三部曲 之二

寒山碧 著

逃 亡

寒山碧的《狂飆年代》三部曲，
是中國近幾十年難得一見的巨著。
本人雖一介商人，看後仍深受感動，
特購置寄贈貴館供保存借閱。

曙光敬贈 2013年

回執請

東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

逃 亡 (長篇小說)

(狂飆年代三部曲) 之二

作 者：寒山碧

校 對：陳添倫、孫德喜、徐秀明、許大昕

封面題字：宗家源

摺頁油畫：林明琛

封面設計：張金如

出 版 者：東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East and West Culture Co Limited

通 訊 處：香港軒尼詩郵政信箱 20107 號

P.O.Box (Hen) 20107 Hong Kong

電 話：2545 1971 圖文傳真：2545 7787

電 郵：honmanpo@yahoo.com.hk

印 刷：博藝坊工作室

地 址：九龍新浦崗六合街九號中溪工業大廈 7 字樓 C 室

電 話：3486 9569 圖文傳真：3012 2694

版 次：2013 年 4 月

國際書號：962-8877-47-X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Published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價：港幣 70.00 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資助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自序

——我寫《狂飆年代》三部曲的心路歷程

寒山碧

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是一個風雲激蕩人妖顛倒的狂飆年代，是中國五千年歷史未出現過的暴烈荒誕的年代。作為一個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寫作人，如果不能把那時的真情實況寫下來，不僅是失職而且是白活了。曹聚仁說，他是為了寫《魯迅評傳》才來香港，還說蔡邕臨死時，也只想續成《漢書》，黃梨洲、萬斯同晚年唯一的寄託就是編次《明史》。我自踏足香港土地那一天起，就想把青少年時期的遭遇，和目睹的種種荒謬悲慘的故事寫出來，可惜一直無法如願。雖然我很早就進入文化界，但當年傳媒的工資和稿酬都很微薄，儘管我每天都寫不少文字，但都只是一些能換米飯的應時之作，自己最想寫的東西一直無法動筆。即使偶而透露一點點抱負，也被人斥之曰：家裡妻哭兒啼，空談甚麼理想？來港初期的貧窮，確實令人有志難伸，家裡無隔宿之粟，怎能去構思和書寫近百萬言不能換錢的長篇小說呢？我被迫把電影鏡頭般縈繞於腦際的影像强行按捺下去，設法餵飽肚子再說，沒想到這個心願一擱就延宕幾十年。

我是一個逃難者，還在襁褓裡就為逃避戰火，到處漂泊；少年時家遭災變，備受凌辱，那時，我唯一的奮鬥目標就是

逃離故鄉；青年時代，國事蝸蟻，暴力泛濫，在中國的土地上，像我這樣的異類無法有基本尊嚴地存活，我唯一的目標便是逃離中國大陸。六十年末我逃抵自由世界時，真正一無所有，唯一有的只是身上的一條三角褲。那時，我也不認為香港是一個可以安身立命之所，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土地，隨時都會被索還？我只想喘息片刻，準備隨時再次逃亡，逃到更遠，逃到甚麼天老地荒的所在。那時年富力強，覺得憑雙手定能養活自己，後來之所以沒有再逃，是覺得香港沒有即時的危險，並發現這個中西合璧的社會還有我可以發揮的空間。人吃飯是為了存活，但存活絕對不僅僅為了吃飯。當初我乘桴浮於海是為了避禍，為了尋找做人基本的尊嚴和人身自由的基本保障。我從不渴望賺很多錢，從不追求豐厚的物質生活，只想生活稍為安穩之後能寫一些自己想寫的東西。八十年代中葉，我的《鄧小平評傳》十分暢銷，這給我帶來一些金錢和聲譽，我也開始思考要靜下來重拾淡忘了記憶，着手撰寫《狂飆年代》三部曲。1988年我在《鄧小平評傳》第三卷（鄧小平時代）《後記》中說：「我已年屆知命，對未來既沒有太美麗的憧憬，也沒有太大的恐懼。十二級的颱風都經過了，再來的風風雨雨又算甚麼？我別無所求，金錢美女不過身外之物，榮華富貴只是過眼雲煙，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未來的歲月裡能夠寫出少年時代的夢。春蠶到死絲方盡，燭炬成灰淚始乾，一個寫作人的願望也只是如此刻卑微。」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時潮流時興人物傳記，傳記的稿約接應不暇，我不得不埋頭去寫人物傳記，創作長篇小說的計劃又告延宕。

在佛道的哲理中，人生只是六道輪迴中最短暫的小站，時光的流轉會使人世間的一切成為過去，永遠消失。於是，作惡者想盡一切辦法掩埋他們的惡行，希望人們的集體記憶隨着他們的軀體化為灰燼，不留任何痕蹟；於是作惡者鼓勵大家向前（錢）看，莫回頭，淡忘過去的一切；於是作惡者大膽編造歷史，讓史書上留下的都是歌功頌德的輝煌篇章；於是年輕人「不知秦漢，無論魏晉」，只知聲色錢權，連二三十年前的歷史悲劇在他們腦海裡也是一片空白。然而，過去的真的永遠過去了嗎？曾經在我們的家園在中國土地上發生過的悲劇和苦難，真的成為過去了，變成空白了嗎？契柯夫說，一切都不會過去，佛道說，業始終隨身（隨身輪迴）。我也相信大地上發生過的一切都不會成為過去，歷史對錯誤和罪惡的拷問不會成為過去，人類的良知更不會成為過去。曾經發生的就會有紀錄，而作家的職責就是要把曾經發生過的悲喜劇記錄下來，不讓它成為過去。

《狂飆年代》三部曲，不是供貴婦們茶餘飯後消遣，不是供荳蔻少女發夢的小說，而是反映五十至七十年代生活現實鮮活的形象的歷史。那三十年，兩岸四地都處在動蕩巨變之中，但真實地反映那個時代的小說，生活在大陸的作家不能寫，寫了也不能發表，不能出版，還會招來殺身之禍；生長於香港、台灣的人沒有興趣去寫，也沒有辦法去寫，因為他們沒有生活，沒有感性認識；如果像我這樣親歷那段悲慘歲月又有幸逃生天的人不去書寫，那麼這一切曾經發生於兩岸四地的真實故事，就會隨着我們年華老去而褪色而淡忘，

也會隨着我們生命的消逝而化為輕煙，永遠消失。那麼，整個大時代留給後世的可能只是一些統計數字，和檔案宗卷裡冷冰冰的史料。後代的人們再也無法想像無法重溫我們存活年代的具體生活。因此書寫《狂飆年代》三部曲我不僅視為個人的心願，而視為時代賦予我的歷史使命，在最困難的時刻都從未想過要放棄。

九十年下葉，香港回歸已成定局，港人面臨去留的重大抉擇，像我這樣心有餘悸的人很難不去思考退路。香港移民高潮時，我也準備好後路，內子在外國買了住所，我也收縮了香港的業務，打算有需要時就離去。那時，空閒的時間比往昔多了，於是嘗試拿起筆來寫些許片段，可惜記憶已經褪色破碎，寫出來的東西碎不成章，只好把稿紙全部撕毀。1998年我在《寒山碧小卷》〈後記〉中說：「最近一年我擯棄雜務，希望重回形象思維燦爛的夢境，但我發現力不從心。記憶的色彩已經淡褪，腦海裡再也無法湧起創作的思潮。莫非少年時代的夢就如此幻滅？我實在感到恐懼。」然而，意想不到一向歧視中華文化的港英當局，在撤離之前做了一件好事，成立了「香港藝術發展局」，使我撰寫《狂飆年代》三部曲的龐大計劃成為有可能。1999年我獲得「藝發局」八萬元寫作資助，使我可以完全擯棄香港的雜務，躲到一處寧靜的海邊，獨自回憶沉思，淫浸於青少年時代的生活，讓褪色的影像慢慢變回清晰，再次像電影鏡頭般在腦海際映現。在那段獨居的日子，有許多個夜深闌靜的時分，我一邊書寫，一邊淌淚，我不知道我的文字能否感動別人，只知道在書寫

的過程中我自己確曾悲慟，苦難歲月的記憶和感覺全回來了。

《還鄉》出版後銷路不太理想，這是意料中事，我在〈後記〉中說：「可以預知台、港和海外年青一代，對這類發生於遙遠的大陸的陳年舊事不感興趣，而對這類題材感興趣的大陸讀者，卻沒有機會看到。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還鄉》將是寂寞的，我的餘生也將是寂寞的。」沒有想到《還鄉》還能在文學圈起到一定的影響，迄今為止評論《還鄉》的文章有十八篇，超過十萬言，其中兩篇發表在中國大陸的大學學報上。然而這不是我最感欣慰的，令我深感欣慰是一位馬來西亞籍老太太。那位老太太的媳婦告訴內子說，有一天她發現婆婆躲在房間裡久久不出來，她擔心有甚麼事發生便輕輕推開房門，看見婆婆在房裡一邊看《還鄉》一邊淌淚。她的婆婆1952年才從潮州嫁到馬來亞檳城，曾親歷家鄉的「土改」運動。她並不是感懷身世，她不是被鬥者，而是農村幹部。她的文化程度估計不高，嫁到馬來西亞後跟着丈夫做了幾十年小販，待兒女成長後才享點清福。我的書是內子送給她媳婦的，想不到這部小說竟然感動一位老太太，賺取她的眼淚。而她的媳婦由於沒有那種生活閱歷，看了也不太受感動。我覺得這位老太太的眼淚比任何一篇褒獎我的論文都更加重要，也更讓我感到欣慰和鼓勵。

《還鄉》的故事從1947年到1962年，我在〈後記〉中說：「《還鄉》只是我計劃寫的《狂飆年代》三部曲的第一部，它的結局並不是整個故事的終結，而是另一個故事的開始」，另一個故事就是第二部曲《逃亡》。大饑餓過後，大陸接踵

而來的是「四清」運動和更加暴烈的文化大革命，大陸嚴格的戶口制度和當時可以隨便抓人批鬥的「造反」行動，使中國逐漸進入紅色恐怖時期，沒有一個人有明天，每一個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故事的主人公沒有戶口，沒有糧食，沒有居所，像被獵犬追趕的野獸，到處逃遁，到處躲藏，被迫走上偷渡之路。主人公的遭遇，我也曾經親歷過，但《逃亡》所寫的絕對不只是我個人的特殊經歷，而是千千萬萬逃亡者的共同經歷。在六七十年代，逃亡是南國水鄉最令人矚目的風景線，那些年，前後逃亡到港澳的人數超過一百萬，書寫逃亡的故事，其意義不在於渲染逃亡過程驚心動魄的情節，而是尋找迫使百萬人不惜拿生命作賭注的背後原因。

第三部《他鄉》是主人公逃抵自由世界後的故事，六十年代下半葉，澳門、香港相繼發生左派暴動，局勢動蕩，族群撕裂，這是港澳歷史未曾有過的。可惜的是時間過了五十年，這段現實生活迄今還未反映到文學作品中來。不僅大陸人民，連香港澳門年青的一代都不知道這段歷史。我曾親歷過這段歲月，不僅對左派暴動印象深刻，對世界各國和台灣在香港的情報活動，也略有所知，對七十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餘波也有瞭解。所以我覺得如果不能把這些寫出來，不能完成《狂飆年代》三部曲創作，將是一生最大的遺憾。2001年我在《還鄉》（初版）〈後記〉中說：「我也一直擔心隨着年華老去，說不準那一天突然會把青年時的夢帶進棺材，讓滿腦子影像隨煙而散，未能在世間留下點滴印記……希望在未來的歲月裡，體力精力和環境還允許我繼續把第二部、第三部寫完。」

這也許仍將是沒有回報的勞動，但沒有關係，寫作雖然艱苦，但在其過程中也能得到別人無法體會的樂趣。」我想完成《狂飆年代》三部曲的意願很強烈，卻因意想不到「原故」再次被迫延宕十一年。2001年當我向「藝發局」申請「寫作資助」撰寫第二部曲《逃亡》時，「藝發局」工作人員告訴我，這個項目已經取消，拒絕接受我的申請表。我覺得局方這項新措施對香港的文學創作十分不利，有意寫長篇小說的作家，假如每天都必須營營役役去謀生，就不可能得到整塊時間去沉思，去寫作。

2004年仲秋，我決定參加新一屆的文學界代表競選，我想進入建制，在局內說話，爭取恢復「寫作資助」，為文學界做一些實事。我僥倖在選舉中勝出，於2005年1月開始擔任「藝發局」委員兼文學組主席。翌年，我游說局內的其他委員的支持，恢復了「寫作資助」這個項目。可是由於利益迴避，我自己無法受益，但在我任期內至少有七位香港作家受益，他們獲得寫作資助可以安心去寫長篇小說。「藝發局」委員和文學組主席都是沒有薪酬的義工（連車馬費也沒有），我在任六年，工作既繁忙，又得賺錢維生，時間更不成塊，《狂飆年代》的第二和第三部的創作計劃也就被迫延宕下去。然而歲月如梭，時不我予，2006年我偕妻兒到三藩市拜訪前輩朋友陸鏗先生，令我受到很大的震撼，我沒想到一場疾病竟然可以把一個人變成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我跟陸大哥（鏗）結交於八十年代，時有往來，1999年我請他來港參加「香港傳記文學學術研討會」時，他還龍精虎猛，妙語如珠。可是

這次我去探望他，他竟連我都認不得了。崔大姐說，他連自己的孩子都認不得了，只認得一個海倫（崔大姐的英文名）。我回到酒店不禁黯然神傷，很擔心自己來不及把第二第三部寫出來就蒙主寵召，或者罹患腦退化症。即使沒患上腦病變，但隨着時光流逝，衰老是不可避免無法抗拒的。人老了體力智力必然有不同程度的削弱，七十歲以上還能寫大部頭作品的作家並不多見，文學史上似乎只有一個托爾斯泰。2010年我已年逾古稀，是年12月，我兩屆任期屆滿，決定不再競選連任，退下來專心寫作。經過兩年的努力《狂飆年代》第二部《逃亡》，第三部《他鄉》終告完成，全書近一百萬言，我總算鬆了一口氣，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夙願。

如今《狂飆年代》三部曲經歷種種挫折和磨難終於與讀者見面了，我內心充滿感恩。我們生長的時代，作家命途多舛，我認識許多老一輩作家都來不及把他們最想寫的東西寫出來就撒手塵寰，我卻能夠在垂老之年完成自己的夙願，當然要感謝上蒼。至於書出版後是否受歡迎？是否起到我期待的影響？抑或它只能躺在冷冷的倉庫裡乏人問津？我不願去細想，因為這不是我所能掌控的。人有人的命運，書大概也有書的命運，有的書寫得並不怎樣，卻能一紙風行，甚至獲得獎項；有的書寫得很好，卻長期遭到冷遇，甚至長期被埋沒，作者又能怎樣呢？《死魂靈》出版時根本沒人買，果戈理要自掏腰包去買回來；曹雪芹貧困潦倒而死，他做夢也想不到身後《紅樓夢》會一紙風行，贏得幾百年的讚譽；司湯達爾的《紅與黑》剛出版時，惡評如潮，乏人問津。而他卻自信

一個世紀後會震動法國。其實用不了等一百年，不夠半個世紀《紅與黑》已震動了整個歐洲。

我並非要跟這些世界名著攀比，時代已經不同了，文學作為一種傳播藝術，它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跟百年前相比，已經大大降低，尤其是在中文世界。我對我的所有著作從來都未寄過不切實際的奢望。如今《狂飆年代》三部曲全都出版了，我於願已足，至少它不會被扼殺於胚胎狀態，至少它可以藏之圖書館，藏之私人的書架上。除非再來一次焚書坑儒，或者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否則它定會長留人間。書印了出來，即使香港的當權者和當紅的評論家不屑一顧，或者給予劣評，我都不會在意。當時間的流水沖掉浮泛的渣滓，當中國人學會了反思，他們就會追尋五六七十年代的歷史真相；當冷冰冰的編年史冷冰冰的統計數字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時，也許有一天，他們偶而會在塵封的書架上發現《狂飆年代》三部曲。我相信這套書能夠滿足他們對形象歷史的追尋，他們將會看到一幅有血有淚的的長卷，將能幫助他們修復重溫當年人們的典型生活。那時，也許我的書會有機會跟大陸的讀者見面了，那時也許我已乘鶴歸去，再拿不到一分錢版稅，再聽不到一聲讚美，但我也會含笑於九泉。

目 錄

（代序）用腳投票

—— 論寒山碧的長篇小說《逃亡》 孫德喜 1

第一章 非 夢..... 15

第二章 結 婚..... 37

第三章 重 逢..... 59

第四章 申 請..... 89

第五章 探 路..... 107

第六章 離 職..... 129

第七章 偷 渡..... 163

第八章 牢 獄..... 189

第九章 勞 改..... 221

第十章 天 問..... 247

第十一章 流 浪..... 267

第十二章 獨 行..... 297

第十三章 逃 遁..... 329

第十四章 知 止..... 361

第十五章 回 家..... 389

第十六章 尋 親..... 413

第十七章 渡 海..... 445

（附錄）荊棘佈滿通往自由的路途

—— 論寒山碧的《狂飆年代》三部曲 孫德喜 476

代 序

用腳投票

——論寒山碧的長篇小說《逃亡》

孫德喜（楊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所謂「用腳投票」（Voting by foot），最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查爾斯·蒂伯特（Charles Tiebout）提出的，最初用於股票交易領域。後來這個詞語的意義引申為：一個地區的民眾通過投奔或者離開來表達對一個政權的態度。在二十世紀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普通民眾無法表達他們對統治者的意見，只有通過逃亡的方式來表達。如果說在內陸地區不斷出現大量的逃荒的人群和盲流者，那麼在靠近香港與澳門的廣東地區，曾經一次又一次湧起逃亡香港與澳門的潮流。對於逃亡港澳，投奔到不同的政治制度的這段歷史，雖然有一些文學作品有所表現，但是仍然不多，而且大多作為一段的故事嵌入某個宏大的整體敘述中，如葉永烈的《馬思聰傳》^[1]、麥子、馬瑞雪的《馬思聰最後二十年》^[2]，有的雖然將逃亡事件作為文學的敘述對象，並且描寫了某些細節，但是那基本上是宏觀的敘述，如陳秉安的《大逃港》^[3]。香港作家寒山碧最近出版的長篇小說《逃亡》則是以一個青年知識分子的視角敘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偷渡澳門的經歷，反映了那個年代的

人以自己的雙腳對極權政治投下的反對票，為中國逃亡文學增添了新的一頁，我們應當予以關注。

—

一個人被迫離開養育自己的土地逃亡到為他國所殖民的土地上，就是他用自己的雙腳給他的國家投上反對的一票。《逃亡》中的主人公林煥然（幼名：林嘉詮，又稱：詮仔）之所以要逃亡到當時為葡萄牙統治的澳門，固然有與他在澳門的妻子團聚的因素，但是根本原因卻是現實的嚴酷逼迫他作出這樣的選擇。林煥然出身於珠江之畔新江的一個華僑家庭，本來生活溫暖而幸福，富有詩意。但是他的這種鄉間田園的快樂生活很快為 1949 年建立的新政權所掀起的政治風暴所摧毀。他的家庭被劃為華僑地主成份以後，遇到了空前的災難：家產被沒收分給了別人；養母不堪受辱而自殺身亡；生身父母親雖然參加了志願軍，並且遵命參與抗美援朝戰爭，但是父親還是被當作國民黨特務被逮捕，並且冤死在勞改農場，母親為了生存而被迫改嫁。林煥然當然也因為家庭成份而受到歧視，遭受懲罰。特別是在 1957 年春天，天真的他以為政治氣候寬鬆了，根本沒有想到那是一場「陽謀」，於是給最高領導人寫信要求糾正家庭被錯劃的成份，糾正父親的冤案，竟然受到了退學的處分。身在極權政治之下，作為普通公民的林煥然沒有人格尊嚴，沒有安全感，沒有說話的權利，沒有精神的自由，甚至最基本的生活所需的衣食也得不到保障，常常生活在莫名的恐懼之中。這樣殘酷的現實令林

煥然感到無法生存下去，從而使他產生了《詩經·碩鼠》中那種強烈愿望：「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早在 1962 年，林煥然就產生了逃亡的念頭，並且他已經擠進了偷渡香港的人群，只是一時猶豫，失去了這個寶貴的機會，從而使他後來不惜以生命做拼搏，歷經千辛萬苦偷渡澳門。林煥然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一個十分偏遠的赤崖鎮中學教書，這裡不僅是個鳥不拉屎的地方，而且這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由於不斷強化的階級鬥爭觀念而變得非常冷漠。最初，林煥然還胸懷理想，希望在文學上的女詩人女詞人研究上有所作為，但是他很快發現這很不現實，一是沒有圖書資料，更重要的是學校經常開會搞政治學習，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因而，不久他就產生了離開這裡的欲望。如何離開這裡？林煥然最初還抱有走正常途徑調離這裡的幻想，他雖然並不非常愛戀方倩怡，但是考慮到與她結婚可以取得僑眷的身份，以便通過合法途徑申請出境。但是，現實卻越來越嚴酷，林煥然所幻想的申請出境的大門竟然漸漸的關上了，哪怕是他的妻子方倩怡懷孕，生孩子，他都不能在身邊照料，而且，中國大陸的政治越來越走向極端，「階級鬥爭」越抓越緊，政治風暴一浪高過一浪，林煥然感到在中國大陸越來越無法生存，也無法忍受了。「他覺得若不能離開中國，這一輩子算是完了，他只能窩在赤崖，或是窩在中國那一個不見天日的地方，像狗一樣活着，不如干脆死掉。」他最終被逼上了偷渡這條充滿艱辛和危險的路。林煥然經歷了三次偷渡。這三次偷渡，對他是非常嚴厲的磨練。第一次偷渡由於遇到強颱風而失敗，他被抓住後受到非

人的折磨，並被關進了監獄；第二次偷渡，他被邊防軍的警犬咬傷而被抓，逃脫後他不得不四處漂泊流浪，睡過墳地，啃過農田裡半成熟的果實，在工地幹起了砸石子的苦活……然而，冷峻的現實並沒有擊垮林煥然，反而更激起他逃亡的勇氣。這或許正如孟子所言：「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4] 林煥然雖然算不上是大人物，但是他在逃亡的路上所遭受的種種苦難，確實磨練了他的毅力和意志，是上蒼對他的考驗，最終，他以自己的雙腳對於極權統治下的中國現實投下了否決票。

二

對於六十年代逃亡的敘事，無論是葉永烈的《馬思聰傳》、麥子、馬瑞雪的《馬思聰最後二十年》，還是陳秉安的《大逃港》，都是外在全視角敘事，而且基本上敘述的是逃亡的現象與曲折的過程，具有非常濃重的歷史的意味，而寒山碧的《逃亡》則是以林煥然的視角來敘述逃亡，不僅具有創新性，而且更有利於揭示逃亡者逃亡的精神動力，逃亡過程中的心理感受，有利於展現逃亡者心靈的創傷和靈魂的痛苦。在六十年代廣東的逃亡潮中，既有單純出於擺脫物質貧困的要求，又有要求與親人團聚的，還有不堪忍受政治迫害和非人待遇的。而小說《逃亡》中的林煥然之所以要逃亡離開中國大陸，包含著以上種種因素。而且，他在小說中既是逃亡者，又是連接寧姐（沈穗寧）、小梁（柏榮）、老伍（志